

# 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

柯 平

我国近代目录学处于古典目录学总结与变革的重要时期。一方面,受西方目录学的影响,产生了新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;另一方面,在整理国粹的过程中,对传统的目录学进行了总结,孙德谦就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。研究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,对于研究近代目录学是十分重要的。

## 一、孙德谦的生平与著述

孙德谦(1869—1935),字益葵,号隘庵,清末元和(今江苏吴县)人。历任江苏通志局纂修、浙江通志局纂修、江苏存古学堂教员、苏州东吴大学及上海国立政治大学、交通大学国文教授。他在经学、校仇学、文学、目录学诸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。

清代考据学盛行,江浙一带,学者聚集,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训诂校仇影响甚大,孙德谦自幼受到他们的影响,他自称少而从事声音训诂,好高邮王氏之学,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后,他觉得考据学实在繁琐,便学习章学诚的思想,李详称之为会稽之学。孙德谦说:“余性好读书,于学则无不窥,弱年而后,始则致力于经小学,能略知声音训诂,于向歆流略,又尝搜辑成编,久之研治诸子,以为颍门之业。”<sup>①</sup>

孙德谦从考据学转向章氏文史校仇学之后,则注重从理、义方面去进行研究,他上溯班书六略,旁逮周季诸子,考其源流,观其会通,成《诸子要略》五十篇。一九一二年撰成《段菊轩先生年谱》,一九一三、一九一四年在《孔教会杂志》上连续发表孔子传弟子考证文章,可见对孔子有深入研究。三十岁以前,他偏好于对目录的研究,推重班志、七略,于一九一七年成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一卷,曾作为开明书店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之一出版。南于寝叟称赞说:“孙子抑安今世渔仲也,平生好章氏之学,积思造微,既于诸子通义发矣,闲涉诸家书目地志艺文之序例室焉,而求其通疑焉,而求其解萃不齐者,而求其齐参伍错综,一一皆于班书得其类例,都凡四十六科。蕃变在乎千载以下,规矩陈乎,千载以上,市有乎不可欺卷,有师不可背也,善己。”<sup>②</sup>孙德谦的同乡曹元忠其时见到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“以为簿录家得此犹文心雕龙,史家之史通也。”<sup>③</sup>

在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完成后,孙德谦又撰成《汉书太史公书义法》。这一时期,他对国学作了全面研究。一九二二年他发表《中国学术要略》一文,称“余往者尝有志为中国学术史矣,兹事体大,未敢操觚率尔。今撮举纲要,以著于篇。”他批评当时治国学者风气有三:好古、风雅、游戏,不足以称为学术。他的批评,实际上是讽刺当时的考据学,倡导章氏学说,具有学术偏见的一面;他鼓吹道学士式的正统学术,反对辞典小说等文学新形式,又有着思想保守的一面。

孙德谦博览群书，对图书有深入的研究。一九二一年他发表《中国四部书阐原》，一九二三年撰成《刘向校仇学纂微》，一九二四年发表《絮秦记图籍考》。他对读书方法也深有体会，认为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“仅求之一字一句，犹是不贤识小，无能观其会通心焉，憾之者久矣”，④于是对读书法分条说明，一九二五年成《古书读法略例》，着重义理会通之法，实是对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的补充。

孙德谦对诗词也颇有研究，先后在《学衡》杂志上发表《六朝丽指序》、《读六朝骈文》等。当时谈论骈体的，称李洋为第一，孙德谦为第二。海宁王国维对孙德谦则有高度评价，他对孙德谦说：“审言过于雕藻，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；君得疏宕之气，我谓审言定不如君”。孙德谦每每引以为自重。

孙德谦结识甚广，与外国学术界人士亦有联系。一九三三年德国颜复礼博士来华，对孙氏汉书艺文志研究产生了兴趣，他将孙氏《刘向校仇学纂微》译成德文。但是孙德谦对于西洋人随意运去我国有用之书，十分气愤，认为“此真中国之奇耻大辱也”，可见他对于祖国遗产的珍视。

孙氏一生著述甚富，已刊行专著八种，发表了大量论文，还有《文选学通义》、《四库全书提要补订》、《中国文学志》等手稿。他对目录学十分重视，目录学既是他读书治学的工具，又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。

## 二、孙德谦的目录学指导思想

孙德谦治学，虽然涉猎广泛，但主要致力于周秦汉名家的研究；而他的研究，又是在一定的学派影响下，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。

王国维说：孙德谦、张尔田“二君为学，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。读书综六略，不为章句破碎之学。孟劬有《史微》，隘庵有《诸子通考》，既籍甚学问”。⑤确实，章学诚的思想对孙德谦影响很大，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主导。虽然他曾好考据之学，但他很快接受了章氏思想，并用这种思想去批判考据之学。

为什么孙德谦从考据学一转而章氏之学呢？大抵有三个原因：

其一：章学诚在考据学盛行时独创文史校讎之学。他的这种独创，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地位，但到了清末，影响渐大，它讲求内容实质，反对只讲形式，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是一致的，孙德谦也必然受到它的影响。

其二：孙德谦始致力于章句之学，未有所成果，且对考据之弊深有体会。他说：“余往者亦尝治此学，久之病其繁琐，故决然去之。但考据之弊，则知之实深。其弊若何。求之形声，而用假借之法，已不免穿凿而附会。乃又专辄臆断，不曰衍文，则曰脱文。无可如何，则归之传写者之误。审如是，读古人书，一任我之，殆无难矣。”⑥比较起来，章氏之学则避考据之弊，因而孙德谦转向于章氏之学。

其三：孙德谦转向章氏之学，与张尔田等人的影响亦有关系。时孙德谦与钱唐张尔田最为要好，海内并称为二雄。张尔田长于史学研究，尤推崇章学诚，他在孙氏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序中说：“君书成，谓必得深于实斋之学者。序我书，余之服膺实斋也。与君同囊，尝纂史微，阐明实斋六经皆史之谊，每相与捭抚尘而笑，莫逆于心、海内同志，落落两人。”

孙德谦继承了章学诚的思想，在许多方面都同章学诚保持着一致：

对考据学风的批判，章学诚是在批判考据学中建立起文史校讎之学的。孙德谦也处处扬

章氏学派之长，抑考据学派之短。他批评当时好古、风雅、游戏的学风，讽刺说：“今之世，将无研国学者乎，曰，彼汉学家言，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。则考据之学是也。虽然，言乎考据，何得即称为国学者乎。”又说“好古三者之失，宜力戒而弗为。支离破碎之考据，亦无事疲其精神。”<sup>⑦</sup>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是从考据学观点写的，而他撰《古书读法略例》则从章氏观点去论读古书，批评考据学者“近世为考据之学者，惟取一字之可通，往往上下文且不统贯。如此读书，岂不陋哉”，如此等等，贬低考据学派。

六经皆史说。章学诚探讨古代学术源流，提出“六经皆史”“史之义出于天”的理论。将历史、政治、哲学三者结合，是章学诚的思想实质，这种对待六经的看法，是近乎历史真实的。孙德谦为此专门写了《申章实斋六经皆史说》云“自隋书经籍志，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既定，唐以后学者，不知经之原出于史也久矣。夫古无所谓经也，史而已矣。”他推崇章学诚说“会稽章实斋先生，长于史学者也。当乾嘉时，说经之士，莫不致功于声音文字。其明乎六书假借，义据通深者，诚不愧为专家之学。至于支离破碎，博而寡要，失之繁琐者，则亦多矣。先生见风会所趋，举世滔滔，务为考据，而于六经之微言大义，则不复推求，以为易掌太卜，书藏外史，礼在宗伯，乐隶司乐，诗领于太师，春秋存乎国史。此六经者，皆古昔帝王之政典，寻章摘句，甚无谓也。于是一言以蔽之曰，六经皆史。呜呼，先生可谓能观其会通矣”，进一步，孙德谦阐明“余故谓六经者经也，而其实史也。”

然而，孙德谦并不是一味照搬章学诚的思想，而是以章学诚的思想为主导，并吸收了义理学派的观点，所以他与章学诚的思想又有不同之处：

章学诚把考据词章说得一无是处，而孙德谦专攻过考据学，对考据名家是称道的，他认为戴震、王念孙诸学者均有专深，认为考据学是治学之工具，并非高深学问，“吾非欲废斥考据也，以此不过为学之初径耳”。“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，陋敦甚焉。”所以，他承认考据学有一定的作用“夫考据家之实事求是，苟善为之，学者何尝不可从事于此。当乾嘉时，治考据者，亦云盛矣，诂经而外，兼及子史，音韵校仇，确有所得，洵可与宋学之迂疏，别树一帜也。”<sup>⑧</sup>这样去看待考据学，是比较客观的。较之章学诚，确是进了一步。

章学诚的文史校仇之学，不仅反对考据派的汉学，而且反对义理派的宋学，说“言义理者似能思矣；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，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”<sup>⑨</sup>。而孙德谦并不排斥义理，认为“汉学宋学各树一帜”“凡有志于学者，当探其义理。”<sup>⑩</sup>他批评读书“不究其义理，而惟断断于此，亦所谓劳而少功矣”这种以义理为重的看法，补充了考据学的不足。

由此可见，孙德谦既把“六经皆史”作为思想主导，又吸取了考据、义理之长，是文史校仇学与考据义理学的提炼。孙德谦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去进行目录学研究的。

章学诚研究目录学，不以“目录学”名，而用校仇学包举，其目的是与考据学相抗衡。而在孙德谦这里，考据学并不是可废之学，他承认“目录学”之名，并强调目录学的作用。乾嘉时期，目录学就存在着以章学诚为首的“义例派”与考据学家“考订派”的斗争，到了清末，这两派斗争仍然存在，孙德谦则是“义例派”的代表，他说“东瀛人士尝谓余之学派近泰西智识分类学”，<sup>⑪</sup>正说明他的目录学是以类例为中心的。

### 三、孙德谦的目录学研究

孙德谦的目录学研究与他对经学、文学、校仇学的研究紧密相关。实际上，他对目录

学的研究是广义的目录学研究，即是图书学的研究。他特别注重秦汉时期目录学研究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如下方面：

### 1. 关于秦代图书状况的研究

历来对图书的研究，都认为书毁于秦代，不知秦代图书的本来面目，孙德谦认为，秦代有收集图书之事，秦始皇虽有焚书之过，却也有收书之功。“至于秦之焚书，贻人口实，由来久矣。隋牛里仁清开献书之路表，历溯书有五厄，以秦居首，事盖有无可讳言者也。虽然，始皇尝曰吾前收天下书，则秦亦有收书之盛举。”<sup>⑫</sup>

他通过对《秦纪》的研究，对秦代图书状况作了考证：（1）秦代图籍聚集时间：通过《家语孔安国后叙》考“秦之聚集书籍在昭王时，多至百余篇。”又根据《高诱吕氏春秋注序》推断，“秦当不书为相时，书之聚集可谓盛矣。”（2）秦代图籍储藏之地与执掌之人。根据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“秦之书籍其储藏之地与执掌之人为史官博士矣。当时焚书只及民间，而在史官博士官，则仍使之职守也。”认为“伏生身为博士，又执掌书籍之人耳。”又根据《史记张丞相列传》为御史、柱下史的记载推断“柱下为秦藏书之地，张苍则其掌书之人也。”（3）秦代图籍名目。孙德谦据《汉书艺文志》《史记》诸书，考证了秦代书籍四十种，可见秦代图书大概。

### 2. 关于刘向刘歆的研究

刘向、刘歆是我国早期的目录学家，孙德谦对他们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。在这方面，他继承章学诚的观点，认为刘向的目录学是校讎学。他说：“校讎之学，始于刘向，非通乎百家学术，固不足语也。”<sup>⑬</sup>因而著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，详细论述。他在《古书读法略例》中总结了十一条校读之法。

《别录》《七略》是刘向、刘歆的目录学成果，对此孙德谦作了研究，他说：“校理书籍，成为专家之学，自汉刘向父子始矣，向所著为别录，歆所著为七略。其书至宋以后，散亡已久，今可考者，惟汉书艺文志而已。特是艺文志祇存六略，歆原本尚有辑略一种。则为班氏所删，颜师古于辑略下注云、谓诸书之总要。其体例必如四库提要，论群书之得失者也。此略不传，深可惜矣。”<sup>⑭</sup>“辑略者，乃撮群书之旨意，为班氏所删去者也，岂班氏以史志艺文，异于专家目录，但掣取纲领可乎，然而书之旨意，向、歆父子所为会撮者，从此不传矣，斯岂非憾事也哉。”<sup>⑮</sup>

### 3. 关于《汉书艺文志》的研究

学术界对于汉书艺文志的研究，最为推崇姚振宗的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，而对孙德谦的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没有重视。张尔田则在《汉书艺文志举例序》中指出了它的独到之处“班志之例定，而后族史之得失定，即一省一府一县征文考献之书亦莫不定，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为功史学，盖不在刘子玄下。”

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分四十六条，对《汉书艺文志》的分类、提要、收录范围、排列等方法作了详细研究。在书目分类方面，《汉书艺文志》每类后用总论，一类中分子目，分类不尽立子目，分别标题、称出入、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、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。在著录方面，有所据书不用条注，称并时，称省，称各，称所加，称所续，书有别名称一曰，此书与彼书同称相似等。在提要方面，有尊师承、辨章得失见后论、一书下掣大旨。通过对《汉书艺文志》这些类例方面的总结，为目录学提供了书目工作方法。

孙德谦研究《汉志》，对于互著、别裁的研究，深得章氏启发，并有新的创见。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有“称省”“称出入”二例，指出《汉志》与《七略》的关系，有称入者，有出此入彼者，又有称省之例。王国维称赞说：“予谓君书精矣，密矣，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备矣，所举各例，本

为修史志编目录者言，故不惮纤悉详尽。其中称出入、称省二例，乃深见刘略与班志之异同，自来读《汉志》者，均未颂言及此，窃叹世之善读书殆未有过于君者也。”<sup>⑩</sup>

#### 4. 四部图书研究

孙德谦对经史子集四部作了探源研究，其《中国四部书阐原》认为四部分类由七略而来，四部分类起于魏晋，而定名于《隋书经籍志》。“自晋秘书监荀勗，因魏郑默中经，更著新簿，始分四部，以总括群书，……然唐修隋书，经史子集，四部之名，由此而定矣。”

他指出后来治四部者，各有弊病，“自有四部以来，治经则训诂义理，各守门户之见，作史则纪传编年，斤斤于体例之间，……至于诸子专家之学，方且屏为异端，无为究其源流得失者。……又有集部既兴，凡能文之士，志在不朽，亦几人各一集，其体例有解有传，其旨则忽儒忽墨，偶然无所归宿，是以历览藏家目录，四部之中，莫多于诗文别集，有由然也。”

### 四、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

孙德谦的目录学研究贯穿了他的“六经皆史”文史义例的指导思想，在对秦代图书、刘向校仇学、汉书艺文志、四部图书诸方面的具体研究中，形成了他对目录学理论、目录学史、目录学方法的想法，归纳起来，他的目录学思想表现在六个方面：

#### 1. 中国目录学的地位

孙德谦认为目录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在《中国学术要略》一文中，对于中国广博之学术，“撮举纲要”，有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舆地之学、簿录之学、金石之学、诸子之学、理学、术数之学、释老之学、诗赋之学、辞章之学、辞曲之学。把目录学列于经小学、史学、舆地学之后，说“……刘向校理中秘，每一书已，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遂成别录二十卷，子歆继之，更造七略。班固因其书，爰删辑略，而名之艺文志。自是而降，王俭、阮孝绪并有撰述，至唐人分立四部，后世秦为不祧之祖，其实则昉自晋秘书监荀勗。盖勗据郑默中经，别著新簿，始取甲乙部目，总括群书，创通其例者也。中国于是乎有簿录之学。…世有希向学术者乎，愿取如上所述，或兼治焉，或专精焉，相与发挥而光大之。”在他看来，目录学是中国传统学术，需要研究发展。

#### 2. 目录之学出于史官

孙德谦认为六经皆史，目录学起源于先秦时史官掌典图书，“隋志云：古者史官，既司典籍，盖有目录，以为纲纪。是目录之学，原本史官”<sup>⑪</sup>那么，孙德谦把目录学研究侧重于先秦，不就是追溯目录学之源吗？继之，孙德谦认为目录学源于史，又属于史学，“夫吾国学术，为类至众，有经学焉，而小学音学，则为经之所属。有史学焉，而地理簿录金石诸学，则为史之所属。”<sup>⑫</sup>说明我国目录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。

#### 3. 目录学的核心是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

孙德谦继承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，认为学术不可不辨，源流不可不分。当时的考订学派目录学家姚振宗、缪荃孙等强调目录学治学门径，利用目录学进行校勘考证。而孙德谦则强调目录学通过类例达到辨学术，考源流的目的，从而发挥目录学兼学术史的作用。

孙德谦推崇刘向、刘歆、班固，正是因为他们的目录学能够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。说“志之以孟荀为儒，老庄为道，所编某入家者，不可稍从移易。盖向歆校书时，不知几经参酌，方定此家数。”<sup>⑬</sup>他认为《七略》《汉志》对于诸子略的处理有政教之分，“儒道小说，圣人之教也，而有所编，兵及医方，圣人之政也。”他批评后来的目录学家未能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。“诸子之

学，并系专家，名法道墨，岂遂无分乎。吾见后之治丙簿书者，其好之也，则归之于儒，若恶之，则直斥之曰异端异端。而能辨其源流得失者，则鲜矣”<sup>②</sup>他认为：读古书亦要辨家数，明宗旨。“古人学问，既各有其家数，读其书者，若不复识辨，杂然紊乱，势必如孟子所叹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。”“司马迁有论六家要旨，班志亦云，各崇所长，以明其旨。故读诸子书，于其宗旨，尤宜辨别之”。他批评一些目录学家不知书之宗旨“自唐柳宗元谓春秋一书，齐之墨者所作，其后目录家遂列之墨家，是岂知晏子之宗旨哉。”实际上他的“辨家数，考宗旨”是对章学诚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思想的发挥。

#### 4. 史志目录学之重要

孙德谦重视史志目录学，是因为“史家之作志，所重在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，除了对《汉书艺文志》研究外，他还撰写过《金史艺文略》。他评论《唐书艺文志》“窃怪道家之中，不应次佛教于后。盖道佛不可强同者也。”一九四四年，《学海》登载了他的遗著《汉书艺文略》。

他说：“艺文之入史志，为目录之初祖。”他论述目录之学有三家，“目录之学，有藏书家焉，有读书家焉，向谓此二家足以尽之。今观于班志，则知又有史家也，试言其分别之，故藏书家编纂目录，于其书之为宋为元，或批或校皆著明之，甚者篇叶之行款，收藏之图记，亦纤悉无遗，至一书之宗旨，则不辨也。盖彼以典籍为玩好之具而已。读书家者加以考据斯固善矣。…”可见，他极力贬藏书家目录，指出读书家特点，抬高史家目录的地位。“史家目录有一代学术寓乎其中，固不同藏家编目徒取记数而已”虽言过其实，但足见他是深通史学目录学的。

#### 5. 推荐书目是读书治学之道

孙德谦倡导读书不可盲目，要讲求义理类例，而推荐书目则可以帮助读者读书治学。他在《国学必读简明目录序》中谈到国学名目繁多，学者难以得门而入，其原因是“由于无人焉择其简要者，编成书目，以为志在讽读者，得所依据耳。”他认为藏书家目录、四库提要等都不能代替推荐书目、“余今以四部之书籍，审辨于胸臆间，参酌去取，为学者所必读，将其至简至要者拟定目录，而如此数书之读法，揭其大旨，复将读可暂缓者，亦为申明其说，广庶几治国学者，可以知所从事也夫。”

他的推荐书目思想与张之洞思想较为接近，他讲求读书要用善本。他说：“张文襄有书目答问，于一书之下，必称某本某本，即示人以善本也。史部有曰，此类若古史及宋以前杂史杂地志。多在通行诸丛书内，以举善本，则其所载书目，有善本者，无不胪举之矣。学者如喜读古书，将求善本，则此书颇便翻检也。”

#### 6. 目录学方法

孙德谦在目录学研究中，特别是通过《汉书艺文志》的研究，探讨了目录学的方法问题，这些方法侧重在著录范围、著录规则、分类、提要诸方面。

著录方面，他认为(1)史志目录不必一一注明出处。(2)著录作者宜详考“编艺文者，于其所生时世必为详考之。”(3)对多著者著录主要者一二人，其余则用“等”字。但也有一书“有数人所作，而姓名得此署者”、(4)一人之书卷数相等者称名。(5)一书多次修订“书为后人加之者，必标明之”，一书有续著者，要注明。(6)一书多名用“一曰”表示。(7)一书为后人编定要载在一起。(8)著录书名和卷数要参考后人所定。(9)书无著者可称某氏所作。(10)一书需注明篇章。(11)书有图者须注明。(12)别裁。(13)互著。(14)一书有残缺者须注明。(15)同姓名者加以区别。(16)书名上可著录职官。(17)书名有简称可只著录简称。(18)一书需著录篇数卷数。

在分类方面，他认为：(1) 书目应有大小序，“班志于一类后既作后论，以究学术之得失矣。其于一略之中，再用总论者何哉，盖后论只及一家，总论则包举全体也。”(2) 对于前人归类不当的，可以出此类入彼类。(3) 一类之中细分子目。(4) 分类要根据实际需要、学科需要，不能强为分立子目。“艺文一志，其于子目也，可分则分之，若不知学问之流别而强为分合之，则非慎言之道也。”(5) 一类中可按标题分。(6) 不同学派可并列一类。(7) 丛书一人之书应集中。

提要方面，他主张：(1) 一书之下要有提要揭示书的旨意。(2) 通过目录提要，体现师承家学。(3) 通过提要记述作者生平著述意图，“撰著之人，目录家考其里居职官与生平之行事，所以为读者计，使之备之颠末也”。

此外，他还主张书目应有图书之统计，“然其用总结之法，观隋唐各志亦既相习成例也。”

孙德谦的目录学，是以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为核心的目录学。他继承了章学诚的义例派目录学的基本思想，在目录学理论、方法各方面又有许多独到之处。他把目录学的研究同经学、校仇学结合起来，强调目录学的学术地位，通过目录学以体现义理。他特别强调史志目录学的作用，对先秦名家有深入研究，他的目录学方法是他的“义例”思想的体现，在分类、著录、提要各方面，他把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作为理论依据。从孙德谦一生对目录学的研究中，我们看到章学诚义例派在清末的影响，看到近代在继承与发展古典目录学上的成就。

今天通过对孙德谦目录学思想的研究，我们应该认识到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是我国目录学的主流。我们应该打破义例派与考订派的界限，发挥目录学的优良传统，促进目录学的研究。

#### 注释：

①④⑪⑬⑭⑱⑳ 见孙德谦《古书读法略例》

②③⑤⑯⑰⑳ 见孙德谦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

⑥⑦⑧⑩ 见孙德谦《评今之治国学者》

⑨ 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原学》

⑫ 见孙德谦《秦记图籍考》

⑮ 见孙德谦《刘向校讎学纂微·撮旨意》

⑲ 见孙德谦《国学必读简明目录序》